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青年自述

- 我的翻译之道…………… 姜椿芳(1)
- 回想北大当年…………… 张申府(19)
- 进北大——藏书楼——蔡元培主校——李大钊和
 红楼——少年中国学会——离校赴法
- 附录：记张申府先生…………… 赵俪生(27)

人物述林

- 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 张申府(31)
- 许寿裳…………… 许世玮(37)
- 家世与少年时代——留学日本——进入教育界
 ——在女师大风潮中——在中央研究院和女子文
 理学院——抗战时期——在台湾
- 何海清事略…………… 何培昆(57)
- 在辛亥革命前后——讨袁护国——靖国护法——
 解甲归田
- 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盛白沙…………… 盛 华(69)
- 徐堪其人其事…………… 陈开国(78)

淮海战役中的刘汝明…………… 李诚一口述 李 宁整理(92)

留恋地盘——东逃淮海南线——一次秘密会议

——不听顾祝同指挥——两次增援黄维兵团未逞

——一场闹剧——献计未遂——出卖孙良诚——

同顾祝同的吵闹

怀念我的丈夫鲍国宝…………… 陈斐君(103)

民盟史料

民盟在西康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

…………… 彭迪先(109)

西康民盟地下武装是怎样搞起来的——民盟在西

康所做的工作——错案终于得到平反

西康盟务五则…………… 赵锡骅(119)

从川大转移到西康——民盟的组织概况和中共的

领导——筹办民生小学——活捉西康特务头子余

仲篪——荣经流动剧团

我在雅安的一段经历…………… 洪 钟(138)

我与荣经盟员并肩战斗的回忆…………… 任康执(141)

我在荣经的战斗历程…………… 刘光烈(145)

参与民盟的领导和决策工作——做青年学生的工

作——农民运动、市民运动及盟友会

见闻纪实

中国留法学生和华工为反对凡尔赛和约而包围

- 公使馆纪实 戴修骏口述(151)
龙云逃离南京纪实 朱志高(153)
宋庆龄祖籍考察纪实 陈漱渝(163)

社会百态

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 暴春霆(173)

晚清奇案

张文祥刺马新貽案真相 陈功懋(184)
一件历史疑案——三个历史人物——谋定后动，
一击而中——司道忙乱，疑诬纷起——熬审中的
张文祥——行刺缘由——刺马案轶闻

资 料

碧血黄花诗词选 刘佐泉辑注(202)

补充·订正·质疑

江亢虎若干史实辨误 完颜绍元(214)
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 张魁堂(216)

耆年自述

我的翻译之道

姜椿芳

姜椿芳（1912—1987），著名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一

在旧社会，要谋一个职业是很困难的。我父亲是一个南货店学徒出身的店员。30多岁时，这个商店倒闭了，他就一直失业，直到老死，再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当我十四五岁时，深受失业之苦的父母，日夜操心，怎样培养我，学点什么，好找个养活家人和自己的职业。

正好这时，到东北谋生多年的大伯父从哈尔滨回到家乡，说可以到哈尔滨去学俄文，学成后去考试，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工作，比较可靠。于是，在1928年，当我16岁时，便远走数千里，到哈尔滨去学习俄文了。

在哈尔滨请了一位俄侨教师，每天学一小时。这位教师不懂中国话，只会英语。他教我俄语，用英语作解释。我的英语程度不高，学俄语靠英语辅助，经常要查英文字典，在学习方面是双重负担，但另一方面，也使我有机会稍稍提高了英语程度。

俄语连续不断地学习了一年，程度还很差，却由于家中经济

困难，无力继续学习，必须以这点资本去找职业。试考了几个地方，没有被录取。其实有些单位据考，只是做做样子，要录取的人早已通过“门子”关系内定了。这样，我就必须也去找“门子”。“门子”是当时哈尔滨社会上很通行的名词，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走后门”、“讲关系”。经过我母亲的奔走，找到了一个同乡人的关系，半考半说情地介绍进中东铁路工务处一个工务段做记账员。那时还不会记账，就先做抄写工作，抄写的是俄文账单和日常事务记录稿。这对于熟悉俄文倒是一个机会。但是好景不长，只做了4个月就被解雇了。1929年夏，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反苏，唆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收回”中东铁路，驱逐苏联铁路领导人员。南京国民党政府则唆使东北张学良地方势力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说苏联外交官和中东铁路的苏联领导人员在东北搞“赤化”活动，“指使”当地的共产党员图谋夺取政权。大部分苏联员工被逮捕，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中苏纠纷”。中苏谈判之后，中东铁路必须恢复原状。我是“纠纷”时期进去工作的。照“伯力协定”行事，类似我这样的职工，应该一律离职。

我失了业。为了生活，并且要养活父母，必须早日找到工作。找工作总要有一技之长，我的唯一之“技”就是学过一年俄文。一种外语只学过一年，怎样也不能用来作赚钱资本的。

这时我虽然读中俄文报纸很勤，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得益不大。中文的小说固然读起来没有困难，俄文的作品就要大查字典了。那时只有日本出版的《露和辞典》可以使用，对于没有学过日文的人，看解释只能一知半解。小小的一篇文章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生吞活剥地读完。

我那时掌握俄语的水平太低了。

1930年初，由朋友的介绍，进“哈尔滨光华通讯社”当翻译。

这个通讯社专发本市新闻。新闻的来源，一是社长交游广，

每天出去东采西访；二是市内各政府机关送来的“正式发布的新闻”；三是从当地俄文报纸上翻译过来的、当天中文报纸上没有的消息，主要是从一份名叫《话筒》的晚报上选择新闻。

通讯社每天要给全市各报发通讯稿，我作为翻译，每天必须译出一两千字的新闻。俄文晚报一般在下午3时左右出版，收到报纸立刻着手翻译（还要先看一下，哪些是中文早报上所没有的消息，哪些消息是值得报道给中国读者的）。新闻必须抓时间，当天的报，当天译；时间有限制，晚7时左右集稿，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板、油印，至晚9时，就得分送到各报馆去。

一个俄语程度很低的人，要在两小时内译出两千字左右的新闻稿，看得懂看不懂的，都要赶快译出；身边没有人可以请教，只能翻查字典；译出来的新闻总要文字通顺，第二天是要见报的。

畏难不干又不行，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职业，生活逼着我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

在上述种种急迫的条件的压力下，我每天过着煎熬的生活：看报、查字典，深思苦想，选译新闻。每天做着“硬译”的工作，俄文水平被强迫逐步提高。这煎熬式的译报工作，一共继续了一年零十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年底之前，日军攻入哈尔滨市，光华通讯社停办，我又失了业。

这是我在翻译的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得到的第一条经验是：做任何事情，包括翻译新闻在内，要能够有所成就，必须有一个艰苦钻研、努力坚持的过程。我将近两年的译报工作，虽没有取得“一技之长”，但在工作的后期，已经能够比较愉快胜任，而且新闻的内容，既是多样化的，有政治、经济，有社会新闻，我就有机会掌握了比较广泛的语汇。所取得的一点进步，都是被逼出来的。

今天的辛勤劳动，明天就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刊登了我译的新闻，未尝没有内心的高兴。这一点又鼓舞自己继

续努力，克服新的困难。

较快地看到劳动果实，是我有所前进的一个动力。这一条也可以算是翻译的第二个经验吧。

二

1931年“九一八”前夜，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到党内工作。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了。

这时，我还是靠翻译来维持生活。我每天从俄文报纸上翻译出中文报纸上所没有的军事的消息（日军的活动，义勇军的斗争），投到《国际协报》去。

这里应该提一下当时《国际协报》的总编辑王研石。他是一位很能干的报人，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者。他那时还兼任上海《申报》和《新闻报》驻东北的特派记者，有关东北义勇军的斗争的电讯和长篇通讯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在日军攻进哈尔滨后，他有条件地担任了《国际协报》的总编辑。他主持笔政之外，还每天为该报副刊撰写张恨水式的章回小说（有一个时期，他一人同时写两篇连载的小说：《长相思》和《北地胭脂》）。就在他主持笔政之时，肖军、肖红等东北作家在该报副刊开始发表作品，白朗在该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王研石到天津主编《益世报》，因刊载爱国言论，遭日寇迫害而死。

就是他，择登了我翻译的军事消息，知道我藉此些微稿费维持生活，他每天尽量多采用一些我的译稿，而且还进一步让我到他家当家庭教师，给他的弟弟和两个孩子教语文和算术。王研石支持我的翻译工作数月之久，帮助我度过了日军占领哈尔滨市后的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我开始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的时期。

1932年5月，党派我到苏联人主办的、用英国人出面经营的英亚电讯社当电讯翻译。

在旧东北军阀政权时代，不许苏联人在东北办报，也不准苏

联塔斯电讯社在东北发电讯稿。苏联人只得通过英美人在东北办报办通讯社。英美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他们办报不受干涉。美国人辛博森在大连办了一份英文报（好像叫《论坛报》，已记不清），英国人哈同·佛利特在哈尔滨办了一份《大光明》（英文译名《哈尔滨观察报》）。塔斯社又通过这位佛利特，先在哈尔滨办了一个电讯社，以“英国亚细亚”为名，简称“英亚社”，实际上发的是塔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的俄文稿在俄文报（由白俄出面主编）上，英文稿在英文报上发表。另外把俄文稿译成中文，分送各中文报选登。开始时，英亚社还在大连和天津设立分社，“九一八”事变后只剩下哈尔滨一个了。伪满洲国成立后，这个通讯社继续存在，门口挂了一面英国旗做掩护。因实际上这是苏联国家通讯社，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表电讯的，内容除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苏联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苏联人民的生活，科学文化新闻外，还报道各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悲苦生活和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黑暗的材料。需要中国共产党派适当的人去做这一工作。过去先后做这一工作的几个党员，已陆续调往他处，我因有些翻译经验，党便派我去做这一工作。

我虽有翻译新闻的经验，但过去在光华社都是译的国内情况，主要是本市新闻，国际新闻并没有译过。到英亚社工作，是在翻译之道上的第二步。电讯稿的特点是每条电讯字数不多，简短而扼要，文字的概括性强，内容涉及的范围也更广。开始做这一工作时，是有一定困难的，但究竟有了一些基本功，不多久也就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个电讯社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又做翻译又当编辑，而且还是抄写员。一天要翻译两三千字。为了赶时间，不可能先打草稿。一拿到电稿，就动笔翻，直接写到蜡纸上，立刻交给人去油印，在晚上送出。

电讯稿起初只分送哈尔滨市各报馆，后来分送到全“满”各

地的中文报馆。采用英亚社电讯稿的报纸相当多，有关中国的消息，较受欢迎。

这个工作我一共做了4年整。到了1936年5月，当中东铁路已经卖给日伪，苏联侨民大部分撤退，出面办报办电讯社的英国人也感觉无法再在伪满工作，就转移阵地到上海。电讯社停办，我才离开。在这四年中，积累了翻译国际问题电讯的一些经验，译稿和刻蜡板的技术也比较熟练了，每小时可达1000字左右。这个翻译之道的第二步的经验是第一步的发展，和第一步一样，时间限制严，速度要求快。通过4年的工作，国际知识面扩大了，政治经济、马列主义理论的术语也掌握得多了。

在这期间，除了做党的工作外，有机会接触较多的苏联报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在文学翻译上试笔，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做了一点准备。

三

1936年春夏之间，和金剑啸同志合编《大北画刊》，由于在这个画刊上发表高尔基病重的消息而被捕。金剑啸同志被押往齐齐哈尔，因为他在那里编过报，演过话剧，被叛徒告密，在那里英勇就义。我和其他同志被释放后，因我全部口供都是假的，估计可能很快重新被捕，于7月底转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翻译之道的第三步。

这年的8月间，进入专门放映苏联电影的上海大戏院和专门经营苏联影片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机构。我的工作是翻译所有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和片中的对白（作为放映时的字幕），每天做报纸上的广告，每有新片，就给报纸写宣传稿。这个工作，使我经常观看苏联影片，包括一再重复的试片，不得公映的禁片，也有更多的机会看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影片。影片是最新型的艺术形式，使我的视野扩大到这个艺术的领

域里，也使我的翻译对象扩大到这个艺术领域里。

最大的收获是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国革命文学艺术的中心，认识了几乎所有的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1936年10月10日，会见了鲁迅先生。《鲁迅日记》里记载说：“十日，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这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文译名《复仇艳遇》。有人把我介绍给鲁迅先生。我指着为这次放映而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册说，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都是根据鲁迅先生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辑成的。并且告诉他，这部影片的翻译名称，国民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改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因为影片即将放映，我匆忙地送给他两张赠券，请他下次来看电影，就分手了。想不到《Dubrovsky》是鲁迅先生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过了一个星期，10月18日，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1936年是著名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30年代的中期，是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也是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上海的进步群众，特别是革命文学艺术界的人士，莫不以看苏联影片为难得的学习机会，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每放映一部新影片，他们都冒着危险（国民党特务监视和盯梢）到这个市内比较偏远的地方来看苏联影片。

上海大戏院位于上海市比较偏远的地方——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原来苏联影片不能在租界上放映，英美当局把苏联影片看作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东西，而虬江路是租界的边缘，一过虬江路就是“中国地界”。影片只要经过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通过（往往是剪去一些革命场面或抹掉革命台词），就可以在中

国土地上放映。苏联影片正是挑选这个地方的上海大戏院放映，而租界里的观众，特别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拥到这里来观看。于是我就有机会认识这些同志，我也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给他们送票，请他们来看苏联电影，请他们开座谈会，评论苏联影片，招待记者，请他们为苏联电影作宣传。我之得以厕身到文艺界，就是通过这个关系。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开始，上海大戏院关闭。上海成为“孤岛”后，租界当局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同意苏联影片在租界上放映，持续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这样，我和苏联影片发行和放映的直接关系，一直维持了五年多。上海沦陷后，在苏联侨民协会放映苏联战事影片（主要观众是中国人），以及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也一直维持着间接关系，做了不少翻译和宣传工作。

约在1939年，我根据影片剪辑记录本，译出了《列宁在十月》，由海燕书店出版。这本书后来又和林淡秋译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合并出版。

我在翻译之道的第三步是通过影片工作，同时也与文艺界的人士有了接触，渐渐受到他们的影响。作为“翻译之道”的“道理”是：长期做一种工作，例如连续多年地翻译新闻、译电讯，虽然也能使翻译技术日臻熟练，如果不越出旧范围，不转入新领域，不追求进步，至多也只能做一个翻译匠。

四

在1936至1937年间，翻译了一些文艺性的东西（如果不把电影故事、对白、评论文章计算在内），例如左琴科的独幕剧《结婚》，发表在《光明》半月刊上；半文艺性的散文发表在《新知识》半月刊上；《祖国进行曲》歌词，由吕骥同志配曲，单张发行。另外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订约，同王季愚同志合译奥斯特洛

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人都因为工作太忙，各自只译了几万字，抗战一发生就停笔了。

1937年抗战开始后，影片公司只给我半薪，我必须另谋生路，只有设法在翻译这条路上讨饭吃。

1937年冬，夏衍同志发起办《译报》，他担任主笔。这是一份别开生面的报纸：一张八开报纸，从上海当天出版的英、俄、法、日等外文报纸上选译新闻，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消息，不加评语，照译照登，不用自己去采访新闻。同时也在三四版刊登文艺性的翻译作品：短篇小说、特写、散文、小品、诗歌等等。这些作品没有时间性，可以从非本市报刊上选译，包括苏联报刊上的文章。我和于伶、王季愚同志，负责从俄文报刊上翻译新闻和文章。

夏衍同志所以发起办这样的报纸，是为了冲破当时租界上封锁新闻的局面。中国军队已撤离上海租界周围的地区，租界周围陷入日军之手，虎视眈眈地威胁着上海，于是上海就成为“孤岛”了。租界上的英美当局宣布严守“中立”，对中日都不偏袒。不许中国人在租界报纸上发表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至多只能采登外国电讯社的一些报道。《译报》在自己的篇幅上开辟了新天地：翻译外文报纸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战事的消息，这就比外国电讯社所报道的要多得得多，详细得多。报纸的面貌，主要看编者的立场，选译什么，不译什么。《译报》转载的新闻，注明出处，文责由外国报纸自负，我们报馆的人没有责任，收到了“以夷制夷”的效果。《译报》一出版，由于它的风格独特，极受广大读者欢迎。

我译新闻，也译其他文艺性和政论性的文章，一半是操旧业，一半是涉足新领域，每天都要译好几篇文艺性的东西。

小《译报》只出版了两个月。1938年春，我们的地下党展开统一战线，和其他党派的进步人士合办了一个大《译报》。它与其他日报一样，刊登自己采访的和选登外国电讯社的消息，有

“译报”之名，而并非单纯的“翻译”，只是每天另附一张译文副刊。

这个大《译报》重金礼聘了一个英国人出面当发行人，每月付给他大笔报酬。根据这个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发表的社论以及副刊的文章，广大读者包括敌人，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党报，它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几百万居民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传作用。

我这时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译文。文章多了老用一个或几个笔名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经常换笔名，从“欧”字发展为“欧飞”。又化为侯飞、厚非；从“非”字又演变为费明、未名、废名等等几十个笔名。后来改不胜改，有时急不择名，看报纸上有什么最普通的字，就随手写上，也算笔名，于是有什么“什”和“之”等字，进而结合为毫无意义的“什之”，再化为“式之”、“十指”等等。渐渐又把译文的内容和性质分类，为每一类文章，用一个或几个固定的笔名，为“杂”文又另起“杂”名。以后在沦陷时期，又用另一批笔名，统共用了几十个上百个笔名。正就是靠了众多的笔名，不用本名，始终不求出名，我得以在上海经历了租界、日伪、国民党好几个“朝代”而苟全下来，不必易地避风，一直当个“翻译之道”上的无名小卒，忍气吞声，默默偷生。

在这期间，也挤时间译了几本书，如伊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韦尔霍格拉德斯基的《上海——罪恶的都市》，苏联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集《有钱的“同志”》等。

这个时期另辟蹊径的一个发展是为李伯龙同志主编的《剧场艺术》翻译戏剧论著，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丹青果的《往事点滴》（分章连载），这三部书都没有译完。另外还译了一些独幕剧：雅鲁纳尔的《破旧的别墅》、《少女的心》、果戈理的《赌棍》等。多幕剧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零星的论戏剧的短文就更多了。我渐渐地成了戏剧专业的翻译者。自己也比较有意识地去寻找剧本，挑选的目标是

能够在上海上演的戏。因为那时我在地下党工作中分担的是搞戏剧运动，这就决定了我的“翻译之道”的一条支路——戏剧之道。

虽是支路，其实也是干路。在“孤岛”时期，我把为报刊翻译各种文章，当作生活之道，用以赚钱维持家计，而把翻译戏剧著作当作正业，经常看戏、看戏剧文章，悉心学习戏剧理论和术语，更注意译剧本如何把台词译得能上口，能使所译的剧本搬上舞台。这是我从电影转到戏剧方面的一段道路，也是“翻译之道”的第四步。

五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向苏联进攻，苏联人民展开了卫国战争。英美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苏联人在上海租界上的地位也起了变化。英美当局开始容许苏联人在租界上进行宣传活动。

这时我们党主办的《译报》等报刊，因为担任发行者的英国人被敌伪收买过去，我们党的几份报刊都被迫停刊，急于要另辟宣传阵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抓住了苏联人的地位在租界上的提高这一时机，派我这个懂俄文的人去和塔斯社负责人商量办一份中文日报。日报没有办成，办了一个《时代》周刊，于1941年8月20日创刊。这个刊物，开始时全部都是翻译，我约了陈冰夷和陈梦海两位同志一同去做这工作。这个《时代》周刊，以后便发展为时代出版社。1942年增出了《苏联文艺》月刊，又在抗战胜利后增出了《时代日报》。以时代出版社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俄文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种翻译风格。这个风格，主要是以鲁迅为师，学习他的“硬译”，竭力做到把原作的意思正确传译出来，把原作的风格表达出来，不轻易增字，不随便减字，在中文上尽量修饰得好一些。这便是“信、达、雅”的要求。我们

时代社的翻译工作者一起提倡这些要求，我个人也向这方面努力。有些译稿由几个译者互相修改，避免差错。

《时代》杂志和《时代日报》的文章，主要是报道性的、政论性的，《苏联文艺》则完全是文艺性的。我和大家一起把主要力量放在翻译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方面。于是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者。由于我还要负责一般性的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也比较多，不得不给自己分配一些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作品来翻译，最适合这种要求的是诗歌、剧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就分配给别的人翻译。我译的诗比较多，虽然我不懂诗，平时自己也不写诗。我和同志们相约，译诗要学习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那样，字数要符合原作的音节，并且要有脚韵，尽可能按照原作的韵律，如果原作四行一阙，一、三行一种韵，二、四行另一种韵，译文也仿照这个格律。译出来的诗，有时有些生硬，但总算为移植俄文诗的格律做了一些尝试。这些发表在《苏联文艺》37期上的几十首诗，我译的和其他同志译的，在解放后辑成一个诗集《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出版。我写了一篇序言阐述我们这种译诗方法的一些想法和实践的结果，主要是介绍了俄文诗的特点及其构成格局。

我翻译的中篇小说有葛洛斯曼的《人民不死》（即茅盾在重庆以英文译的《人民是不朽的》）。短篇小说集有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和一些别的作家的多篇短篇小说。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没有译完（原作也未写完）。剧本有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先用散文译出发表，后来又按原作的形式改成韵文，但没有做到原作格律的严谨要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尔基的《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解放后译了高尔基的剧本《敌人》、《怪人》、《小孩子》等，收在《高尔基剧作集》里；译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和《肥缺》，将收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选》里）。现代苏联作家的剧本有：柯尔纳楚克的《战线》（即肖三同志在延安译的《前线》）、

列翁诺夫的《侵略》、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伊里英柯夫的《花园》。

时代出版社是由罗果夫支持，用“苏商”名义经营的。罗果夫本人爱好文学，《苏联文艺》由他主编，作品都是他挑选的，他想尽方法弄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版的各种文艺刊物，所选的作品确实是那个时期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他还在时代杂志上开辟了《高尔基研究》专辑，每隔一个月左右出一次，发表了不少高尔基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后来出版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选》）和关于高尔基的许多研究文章。抗战胜利后，还专门出版了《高尔基研究年刊》（主要是罗果夫和戈宝权主持，我也译了一些文章）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由戈宝权和我主编。

时代出版社经历了三个不寻常的时期：英美当局统治的租界时期（“孤岛”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前后有八年之久。1949年迎了解放，又持续了三年多。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十多年，从事文学、戏剧的翻译工作，是我“翻译之道”的第五步。这一步是我翻译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十多年的翻译实践，取得的经验是：翻译必须按照鲁迅先生提出的原则进行，“信、达、雅”三者都要考虑到，重要的是信，宁信不雅，即使“硬译”得有些生硬，也要把原作的思想、精神传达给读者。

时代社逐渐集中了将近20位专业翻译者，这是别的出版社所不能做到的。这些有共同翻译观点的，至少有类似翻译风格的翻译者，于1953年时代社解散后，分散到全国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科研单位，带去了自己的作风。

六

1952年我被调到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工作，1953年又